

中文版第九期

第四年 第三冊

辛酉
年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中國馬
中國自然歷史、古代醫學上的馬
風水

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堪輿學
十六世紀作家眼中的北京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
書籍是你的良師益友，欲購買請到
澳門板樟堂街16-18號葡文書局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是一部傑作，
由兩國人民譜寫。
作家、詩人、學者
妙筆生花，
澳門因之生輝，
青史長留。
書，良師益友，
書，智慧結晶。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版編輯

黃曉峰

美術主任

馬偉達

助理編輯

徐新 周劍明

美術設計

鄒志全

排版

曾亮文

植字

梁孔彪 林秀華

攝影

鄧顯熙 林國權

印刷

澳門印刷公司

分色

色擇分色有限公司

出版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部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

新安大廈87—U 電話：700391

編輯部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

新安大廈87—U 電話：700391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at the bottom of the text block.

出版刊物
文化消息

出版消息
主要文化活動

澳門歷史檔案館的新設施

視覺藝術學院

澳門有一支樂隊

第三屆澳門國際音樂節

畢加索在澳門

吳衛鳴版畫上的澳門

澳門掌故——雕石

伊納西奧·薩爾明托

白易居詩賦中的酒與智慧

卡米洛·庇山耶：詩人·法官·人

十六世紀作家眼中的北京：城市的神話

一種土語的生存和死亡

澳門「風水」

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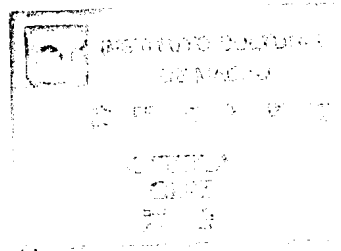
澳門民間對邪氣的認識

中國自然歷史及古代醫學上的「馬」

中國馬

中國古代的馬歷史、象徵神話

宗旨



辛耀華
貝禮道
查偉革

官龍耀

阿古斯蒂娜·貝莎·路易斯

文德泉神父

安東尼奧·戈拉薩·德阿布拉烏

維伊加·德·奧里維拉

瑪利亞·萊奧諾·布埃斯庫

依莎貝·湯馬斯

路易斯·奧爾特

拉蒙·賴·馬佐

安娜·麗亞·安瑪羅

路易斯·貢薩卡·高美士

官龍耀

馬若龍



目錄

《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九期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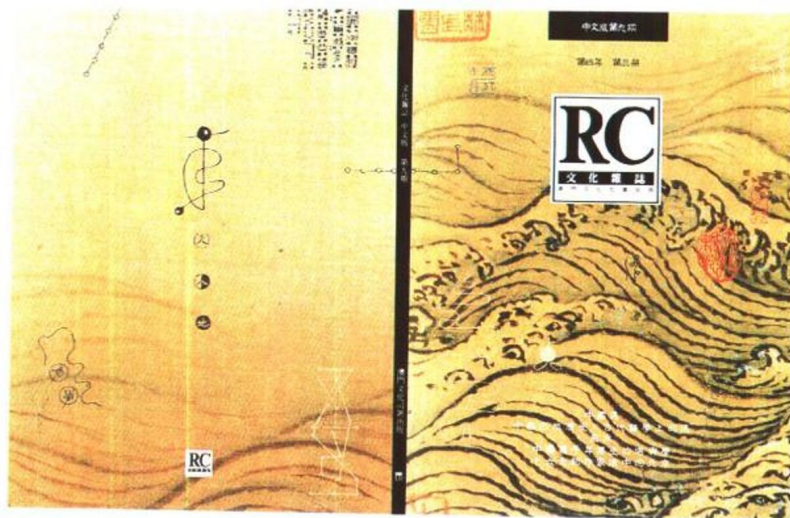


3 5 24 29 32 41 53 57 65 73 86 90 94 96 98 100 101 104 106 109 116

封面說明：

第九期《文化雜誌》選用馬遠（1190—1224）著名的“水圖”局部作封面。該圖隱含着“風水”的象徵意義，畫家是南宋畫院畫家，與本期有關“馬”的主要論文同一時代。

馬遠是宋朝學院派畫家的佼佼者，善作絹本山水畫，其細緻的描繪技巧甚為突出，作品如詩如樂，集開放、浪漫、朦朧和哀婉美感於一身。從他的畫裏，我們可找尋到單色的摹壁畫和道家學說中的“爻象”和“符籙”的影子，不失為反映大自然美景的佳作。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九期

文章作者：

官龍耀
 路易斯·貢薩卡·高美士
 安娜·馬麗亞·亞瑪羅
 拉蒙·賴·馬佐
 路易士·奧爾特
 依莎貝·湯馬斯
 瑪麗亞·萊奧諾·布埃斯庫
 維伊加·德·奧里維拉
 安東尼奧·戈拉薩·德·阿布列烏
 文德泉神父
 阿古斯帝娜·貝莎·路易斯
 貝禮道
 伊薩烏·桑托斯
 維加·納爾丁

插圖：

馬偉達

特別協助：

澳門歷史檔案館，丹尼亞·比利斯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中葡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政治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觀點和理論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的(三種文版)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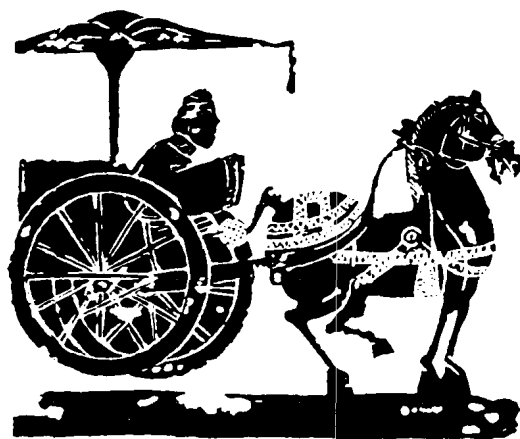
《文化雜誌》，已是社會學者們共同的園地。這一點，至少某些社會學思想家是這樣認為的。它在幫助人們認識凝聚人們共同生存的社會體系方面，確起着核心作用。而這一體系是具有處於居於社會之上而不受偶然和突發事件影響的地位。從本期開始，作為一個參與和對澳門文化司署主辦的《文化雜誌》負有領導責任的我清醒地知道，《文化雜誌》是以深遠精神構思的，具有永久性，故而，它具有法制的感召力。這正是本屆文化司期在此以這一簡短出版宗旨想強調的真義。《文化雜誌》也將自本期開始一個新的階段。值此，我首先要提出“連續性”這個詞。其次，要提出“信心”這個詞。我對官龍耀先生被委任為《文化雜誌》的主編以及作為出版辦公室的撰稿人，對其在這方面的卓越領導才能，深具信心。同樣，對前特別策劃辦公室的全體同仁深具信心。文化的要素包羅萬象，也具有植根於歷史現象和凌駕於社會暫時轉變之上的“體制性”。而本刊正是作為文化和文化活動的基本標誌展示在我們面前，為着享有和學習，它就如放開纜繩的帆船，將開始眾多的未來航程，駛向無數的海岸，匯集在眾多人的手裏，進行廣泛的精神交流。有鑑於這樣理解文化，這裏我想提出另一個詞語“目的”，它同樣是我們明智的文化政策的鵠的：《文化雜誌》，是澳門及葡萄牙在東方和世界存在的連續性之不可替代的工具，也是葡萄牙與中國間的互相認識不斷加深及其歷史交匯連續性之不可替代的工具。《文化雜誌》是一份具有突出特點的刊物，它以三種文字出版，作為文化的工具，具有極為廣泛的潛力，在國際上其代表澳門形象和反映澳門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誠然，起到這種作用並不容易。因三種文本之中任何一種文本的出版，繁雜的需求條件使它的編輯出版過程既辛苦又要求嚴格。然而，這沒能阻擋住《文化雜誌》過

往能以其內容和繪畫藝術的高質素，而發行遍及全世界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有關各界和學者之中。不過，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淺嚐輒止的，現在僅是一個開端。我們希望以同樣精神在履任期內，在爭取達到上述目的過程中，它的作用得以肯定地發揮。為此，第一，要增強人力結構，以便確保雜誌出版的程序和正常性，提高中、英文本質量，提高獎勵，加強宣傳，徵求新訂戶，擴大雜誌的發行人數；第二，公正地承認作者的地位和對文化及出版政策進行慎重研究特具重要性，這一切將是爲了保證與我們的撰稿人之間的關係和氣氛得到改善；第三，要在《文化雜誌》的國際化方面邁開決定的步伐。在繼續保持已有合作的同時，竭盡所能邀請全世界，特別是中國的水平較高的研究機構人員和漢學家給予充份合作，並使合作的質量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這裏，我們衷心祝願馬年1990年——生氣蓬勃的象徵，大家心想事成！



澳門文化司
馬若龍



中國古代的馬

歷史、象徵與神話

官龍耀

Luís Sá Cunha

一、歷史上的馬

抵禦戰馬的“長城”

在中國人的傳統和歷史裏，馬是無所不在的。在中國歷史的遠古時期就已出現了用青銅鑄成的馬。除了神話中的龍之外，中國人認為馬是世間萬物中最為卓越的動物。

馬作為一種象徵，神話般地伴隨了古老中國的原始時期，甚至起源時期。作為純粹男性力量（陽）的象徵，馬的出現要比龍早得多，儘管後來在中國複雜的象徵學演繹過程中，馬被龍的形象所融合，乃至代替。

直至今日，人們依然視馬為速度、耐力、想象力和青春活力的象徵。

人們稱呼一匹充滿了生命力而又行動敏捷的馬兒為“千里駒”。馬被喻為“火”與“午”，是佛教七寶之一，又是十二地支中的第七支。馬是中國十二肖屬之一，今年，一九九〇年是農曆庚午年，也就是馬年。^①

從歷史角度看，馬是如此深刻地影響着中央帝國，以至於在它的地表上永久地留下了地球上最大的疤痕——萬里長城。

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高度文明，一種農業的、祥和的文明，這種文明充份反映在中國的禮樂儀式中。就像溫順的壯馬服從於天神的安排，古老的中國也時時刻刻生活在游牧部落威脅其和平的恐懼中。

“外部的愚昧”包圍着作為世界中心的古老中國。風兒呼嘯着刮過廣闊無邊而又荒涼的大草原。這裏是游牧部落的居住區；是牧人和游牧部落的狩獵者們的馬隊活動區域。他們終日生活在馬背上，在馬上挽弓射箭，在馬上狩獵，或組成騎兵發動戰爭，迅雷般地出擊。他們祈禱、供奉馬之神。當死亡降臨時，他們最終和馬葬在一起。

自第二個王朝（商朝，公元前一七六五？——一二二年？）始，中國就已擁有造車的技術。

從青銅器時代極為簡略的製車草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這類輕便的車輛仍以它精美的結構揭示了中國人的精湛的美學觀念。然而在車輛的製作中則突出了中國宇宙觀中宗教的規律：正方形的車廂（地），上方覆以穹窿形的蓬蓋（天），全車由如前所說的由火（馬）來帶動。

問題在於諾亞的子孫們早已被逐出了天堂，歷史本身就是一部艱難生存和殘酷戰爭的歷史。中國人的實用主義精神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精煉。



一位勇猛的古獵人戎裝畫像，他腰懸弓箭，正備鞍待發。

中國安寧，文明的城市被蠻夷的好戰民族包圍着。

中國古老的防禦機制的基礎是把軍民分散駐紮在築有城牆的各類城堡中（一如意大利人Du Halde 在他留傳下來的書信集中所記載的），這種防禦機制用以對付游牧部落所進行的游擊戰是脆弱的。游牧部落在環境惡劣的大草原上被錘煉得驍勇善戰，他們是最優秀的騎手和射手，跨着矮種馬迅猛無比地出擊，一擊得手便即逃遁，不受任何懲罰地消失在馬蹄掀起的萬丈煙塵中，去向不明。

游牧部落的卑下在於不瞭解中國人的禮樂制度。但是，如果說這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優勢，那麼同時它則給中國的防務帶來了不利；蠻夷的力量在於其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祇要他們的居住地，食物和服裝還保留着野蠻、粗俗的特點，其人民就仍然保持着殘暴、野蠻的特性，他們的習慣就很難以被改變，因而也就能夠獲得巨利。^②

這一狀況使人們看到，在長達數個世紀的歲月裏，中國處在一把懸掛着的雙刃劍下。文明與滅亡，野蠻和生存相間交替進行。人們看到中國拚命抗爭着不在文化領域內作出讓步的同時，她被劍矛投刺得遍體鱗傷，為能繼續生存，她使她的某一部份變得“野蠻”，這就是她的軍隊。

游牧部落的騎兵能夠在所有的地方機動作戰，而在很多情況下，車輛祇能緩緩而行，無法同騎兵協同作戰。這樣，騎兵和馬的重要性及其戰略價值就理所當然地上升了。

面對着不斷遭受侵擾的環境，中國人的意識清晰地反映在當時的一些繪畫作品中。在這些畫面上，中國人以一種自視優越而蔑視游牧部落的方式，幽默地把蠻夷描繪如下形象：身着粗俗的服裝，表情兇殘，鼻子極為誇張地彎曲，多呈現怒容、猖狂的儀態。在另一些彩色繪畫中，描繪了游牧部落的使臣訪問皇城的情景，在平和、臣



服的睦隣所饋贈的外交禮品中，通常都突出馬，把它作為信物和最珍貴禮品的象徵。

顯而易見，中國使用馬的歷史是很悠久的。如同Du Halde 向我們所證實的，不少文章也論證了以下歷史，即還在奧古斯特一、二、三世的年代裏，神話般的中國最初的皇帝們，確切地說就是第三個皇帝，“他同樣發明了車，並下令捕獲牛馬以馴化之”。^③

在這方面（廣泛並實際地使用馴化動物為人類服務）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馬總是同牛聯繫在一起。幾個世紀中，馬王神被中國人和遊牧部落仰慕崇拜，它的形象出現在吉祥的標記物上，並被安放在寺廟和牲畜欄內，用以驅除動物的疾病和不祥的鬼怪。那是一種有着三隻眼睛的嚇人怪物，有許多手臂，揮舞着各式兵器。它的腳旁有一匹朱紅色的馬。它的左邊，在一個形同登壇的牲口槽上，也還有牛王神。

在數百年中，堅持不懈地努力改良馬的品種一直是為各個朝代的中國人所關注的事。

前漢或稱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五年）武帝時期（公元前一四一—一八七年）已是一個新型騎兵發揮其巨大作用的時期。在一次武帝遠征匈奴的戰爭中（公元前一三三—一二一年），佔領了匈奴的首都，那裏集中着匈奴最好的馬匹。^④

通過大量地同從西域各王國獲得的新的良種馬的交配改良了中國馬的體型，一種優良馬種在中國出現了，這使得帝王和貴族士大夫們更加沉緬於對馬的喜好之中。馬，機敏，線條勻稱美觀，風馳電掣地奔跑，人們稱呼他為“天馬”。

在雷台（甘肅省武威地區）發掘到的後漢年間（公元二五—一二〇年）用青銅鑄就的無與倫比的馬，正是這崇馬習俗的體現。這一青銅器被稱為“馬踏飛燕”。最近，這匹青銅駿馬被評選為中國旅遊的標誌非偶然，這是在向中國偉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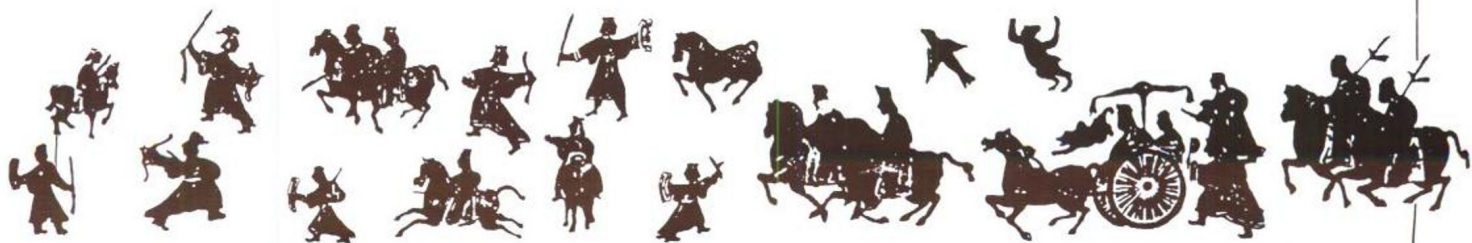
馬王爺與牛王爺二神合像，民間常貼掛於牛棚馬廄，以求“槽頭興旺”（轉載自聖彼得堡阿烏羅拉出版社《中國民俗畫》一書，原畫藏聖彼得堡艾爾米特利略博物館）。

能工巧匠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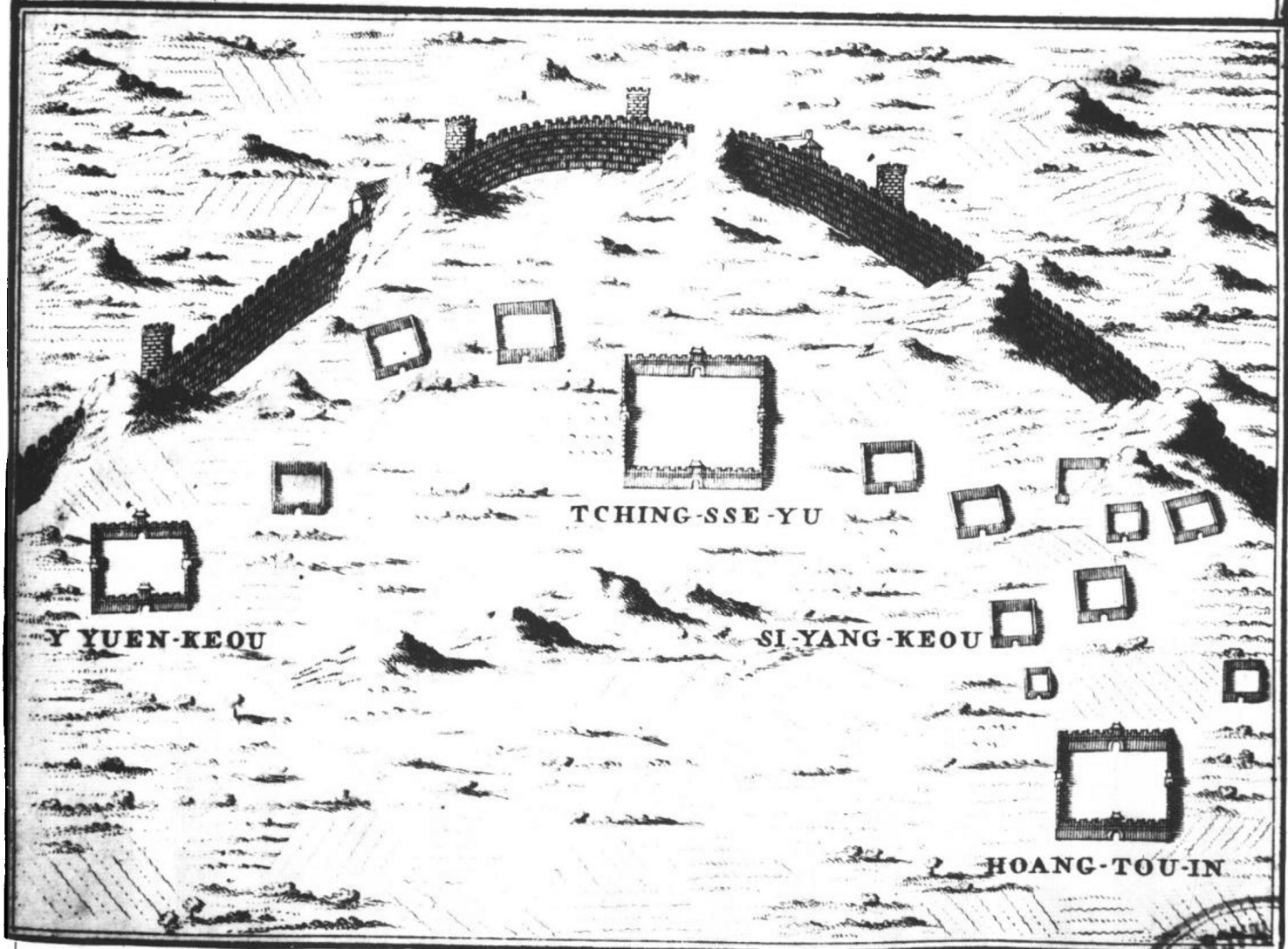
萬里長城始建於第三王朝，即周朝（公元前一一二—前二二二年），最初它祇是一段一段的城牆，後因連年不斷地承受防禦的壓力而不停地加以修築，才於中華帝國誕生的年代裏（公元前二二一年）經過艱苦的經營，使其最終連結在一起。由於面臨匈奴部落聯盟的首領頭曼所指揮的匈奴軍隊的入侵威脅，迫使秦始皇和其大臣李斯下決心把萬里長城一直修築至東海邊。

當人們看到古代中國的十八個省地理上都處在長城以南，因而受到長城的保護，便會毫不猶豫地得出結論：中國人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北方的大草原。

在月亮上用肉眼即能看到的中國的萬里長城就是這樣被修建起來的，用以對抗遊牧部落游擊



PLAN d'une partie de la
GRANDE MURAILLE
du Côté de YUNG PING FOU,
Soutenuë par
diverses Places de Guerre.



長城局部圖，圖中顯示了由關隘組成的區域防禦體系。

式的可怕侵襲。

但是，對抗如此強悍的敵人光靠長城是不行的，還需要靠另一座有效的長城，即由馬所組成的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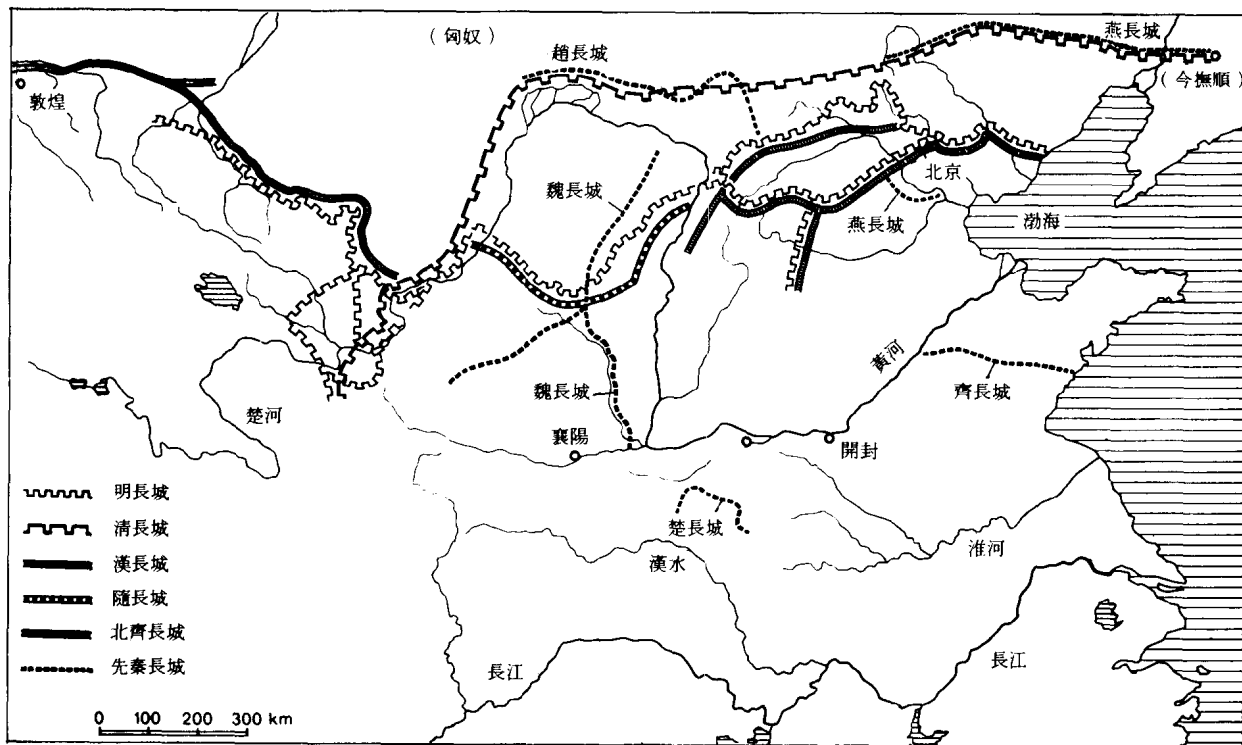
騎兵與帝國

當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Du Halde 在許多世紀後（十七世紀）向我們“描述中華帝國和中國的韃靼人”時，他有時向我們提到馬這一高貴的動物。在二千多年漫長的歲月裏，它是中央帝國悠久歷史中一個經常性的角色，並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通過Du Halde，我們瞭解到在四川省盛產矮種馬，它們“極其漂亮，強壯”，“因而為人們竟相爭購”；在雲南省可以見到“非常好的馬，它們大部分是戰馬，健壯而又生機勃勃”。他還親眼見到“在蒙古大地上”“牧馬和野馬的數量要比西方多得多”。

根據他的描述，那時“沿着萬里長城，在築有城牆的城鎮內駐紮着七十七萬兵士”，同時皇帝還牧養着近五十六萬五千匹馬，除作為軍騎之外，還供向各省傳遞皇帝和刑部的命令的驛差使用”。^⑤

然而，對中國歷史匆促的一瞥就能發現一種特有的現象：一個王朝的和平時期，王朝建立或穩定的時期，簡言之，即一個王朝建立並有效地行使其權力的時期，都是和騎兵的強盛密不可分的。這一狀況被以後幾個世紀，乃至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情況所證實。無論是一個王朝攻城掠地向鄰國進行擴張的強盛時期，還是與此相反走向沒落和滅亡的時期，都同騎兵的盛衰密切相關。在歷史上這一狀況反復出現，也揭示了另一種特有的現象，帶有地緣政治特點的現象：中國嚴重而又持久的威脅來自北方。這片位於中國北部的廣袤大地哺育、壯大了匈奴、蒙古人和滿州人的祖先。這片土地一直延伸並伸入亞洲大陸的



中國地圖中展示的長城及其歷代演變過程。



心臟，而這些民族正處在這一自然地理位置上。

當聽着聖·佛郎西斯科娓娓動聽地宣講宇宙間人類與動物的友愛時，十三世紀初葉的歐洲人很難想象：當時棲身於戈壁灘水草柔美的牧場上的成千上萬匹馬，在數十年後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率領蒙古大軍直抵君士坦丁堡和匈牙利時，它們的鐵蹄是如此強烈地震撼了歐洲大地。

成吉思汗（意為所有人的皇帝）組織了探馬赤軍，每萬人為一隊，並發展了驛站制度，沿主要道路每百英里設一個驛站，每站有兵士及一名統領駐守。據馬可·波羅的描述，在王朝全境內約有一萬個驛站，有三十萬匹以上的馬為其服務。

驍悍的蒙古騎兵往往都在戰鬥爆發的一瞬間突然出現。他們在令人戰慄的沉寂中隨着指揮官用旗語發出的命令行動，各騎兵分隊的軍官則揮動手臂重複指揮軍的命令率領部下進擊。夜間，命令是由緊靠可汗大帳旌旗的發光信號物來傳達的。他們偏愛的戰術是迂迴、包圍及誘敵深入。⑥

顯然，無論是上述驛站制度，戰場上使用的策略，還是用信號來指揮部隊的方法，都僅僅是吸收、發展了早在幾個世紀前就已存在的東西，其中不乏受到“蠻夷學校”的啟發，中國在自己的防衛體系中早已採用過的戰術方法。

聯想到五百年後，由於馬的力量，滿州人來到了紫禁城內。如同衆多帝王寶座的奪取者一樣，滿州人向這些強有力的侍者表達了適當的感恩之情。滿州軍官古老服裝的袖口處開着形似馬蹄的硬袖口，人們以留辮子或者拖着辮子為時髦，

這是滿清王朝為中國人所創立的習慣。辮子被編成馬尾狀，意為向協助滿清奪取勝利的可貴合作者致意。⑦

由此上溯到公元前，自秦王朝（公元前二五一—二〇七年）末期至後漢或稱西漢（因建都長安或稱西安而得名）末期，馬便開始在中國歷史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這種狀況延續到後來的各個朝代，直到唐朝的太平盛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幾十年的偉大考古發現，向研究人員和鑒定人員提供了新的研究報告，澄清了一些古老的題目，並為研究另外一些新的課題打下了基礎。

一九七四年三月，在陝西省的臨潼，距被尊為中國第一個皇帝的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二一〇年）陵外圍僅一公里處，開始了被譽為人類現代史上最偉大的考古發掘工作。

這是一組由七千個如實際人物一樣大小的陶俑藝術品所組成的聞名於世的軍隊。“傳奇式的”秦始皇試圖以此使自己永垂青史並在死後依舊盡情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根據中國古老的觀念，給帝王生前帶來榮耀的侍衛部隊，在其死後，仍將在極樂世界中侍衛他。鑒於上面說過的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我們毫不懷疑，秦始皇能戰勝諸國封建割據王國第一次統一中國，是因為秦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它的騎兵十分適應戰爭環境，具有極大的機動性。依據這一戰略思想，秦國的軍隊打勝了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戰例。它策劃了一場對趙國的戰爭，後來成為中國皇帝的秦始皇祇動用了五千騎兵，就穿插滲透到敵軍之中，消滅了近四萬敵兵。

毋庸置疑，古時候的戰車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戰爭武器。秦時的戰車用木頭製成，兩個輪子的直徑高達1.08米。當戰車組成方陣，衝向不很堅固的陣地或是橫屍遍野的戰場時，它們經常是緩緩前行的機器，同時又是死亡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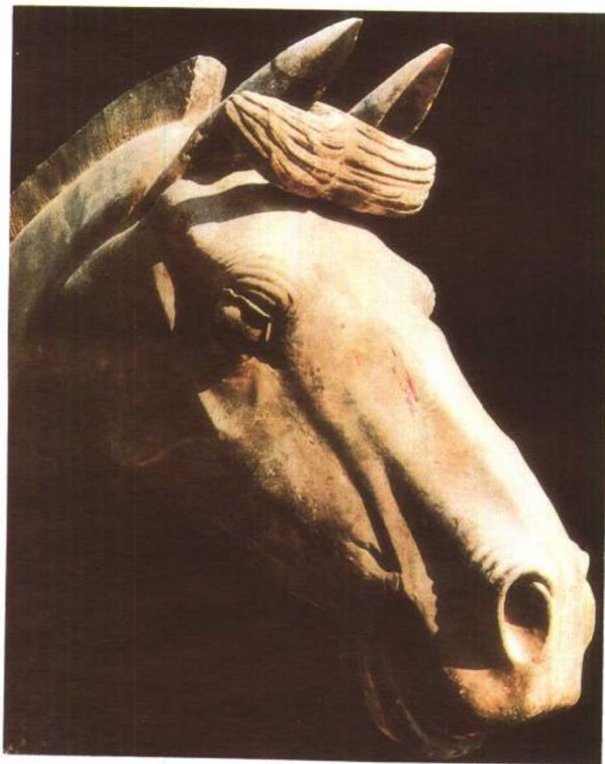
這種輕便耐用的戰車同青銅器時代亞洲西部地區的車輻（方形的車廂，彎曲的輻，由馬匹脖子上繫着靈便頸圈—呈鞍橋形的輻的馬拉著）十分相似。當你瞭解到，大約公元前十七世紀在小亞細亞和敘利亞也曾出現過類似的車輛，以及馴



《獵鹿圖》，作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他亦以到北京後取的名字郎世寧而為世所知，他是經傳教士們的請求，由耶穌會會長派送來華，先後為三位皇帝擔任畫師和建築師，尤以擅長畫馬著稱，他筆下駿馬的“奔騰之態”，對中國畫家們頗有影響，而他也向後者學會了在玻璃上繪製油畫，和在絲綢上繪製彩墨畫的技法。

化後用作拉車的馬，對以上情況就不會感到特別驚訝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中國殷商王朝時期（公元前一七六五——一二二二年或一五五八——一〇五〇年），這種車輛就已被使用了。考古發現證明，在那一時期，帝王死後，套車駕轅的馬已作為殉葬品被活埋在陵墓中。



陶俑馬頭部（臨渾出土）。

通過觀察、熟悉並戰勝鄰近大草原上的可怕敵手，秦國的戰略家們意識到，在軍事行動中使用騎兵具有巨大的作用。

三世紀末，騎兵已被確定為（或被逐步確認為）是各種對抗的決定性力量。然而，中國早在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一——公元前二二二年）末期即東周（因在東面的洛陽建都而得名），上述見解已十分流行。

另有些人認為比戰車（鐵甲騎兵）更為迅捷更為機動的騎兵始現於公元前四世紀的北方諸國中，在那裏人們模仿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而建立了騎兵，同時改穿胡服（使袍子和褲子實用地結

合起來的服裝）進行騎射。

據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八六年）在其著作《史記》中所提到的，趙武靈王（公元前三二五——二九九年）開始仿效游牧部落訓練趙國的騎士在飛奔的馬的背上挽弓射箭。

面對着臨渾保持着原貌的恢宏的地下軍陣，一些考古學家指出，從一些戰車的形狀看，戰車仍未脫離其最初的用途，主要用於驛差、聯絡，或作為觀察所和遠送指揮官的用車。

考古學家還注意到，地下軍陣中的馬都被雕塑成同一品種。它們都有強壯的體魄，結實的大腿，寬厚的脖子上是狹窄的頭部，但比例準確。馬鬃被剪得短短的，兩條長長的辮從綴成狀如削竹的馬耳中穿過。馬尾則有些不同以區別兩種不同用途的馬。拉車的馬，其尾部被縛了起來或被綁紮得非常短。當作坐騎的馬，其尾部則是放開的，呈自然下垂狀。^⑧

從馬的骨骼看（陶馬身長二·〇五米，體高一·七二米）當時中亞的混血馬的比例在上升。

這些都反映了對馬長期堅持優選，嚴格訓練和馴育所帶來的結果。雕塑形象地表現了馬的風姿：騎士雙手緊握轡繩，馬則期待着奔騰，顯得焦躁不安，馬耳機警地斜聳着，鼻翼喘息般地微微欽張，牙齒緊咬着滴銜，馬口微張——一切都似在聆聽主人的號令，欲奮蹄飛馳。

“天馬”與“飛馬”

對馬和騎兵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至西漢時期（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人們已被迫接受了這一認識。為了獲得馬並培育出良種馬，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也使馬的價格達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騎兵開始被正式組建成戰場軍事行動的核心。

西漢的第四個皇帝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前一五六六年）受其軍師晁錯的影響。曾下令任何家庭祇要交給國家一匹馬及車輛，即可免交賦稅並允許該家庭中的三名男丁免服兵役，這一法令的用意是十分明確的。

漢王朝自建國以來，在北方邊境上就一直面



臨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馬俑。同樣的兵馬俑尚有近七千尊，為廿三歲至四十歲，身高至少為1.73米。由此可以斷定該馬屬於人與馬的尺寸比例，在中國古代，男子在騎兵中服役的年齡，為考古學家提供了珍貴的研究資料。這裏，我們特別注意到中亞馬種與後世馬種殊異。

臨着强悍而又侵略成性的匈奴的巨大壓力。

遼闊草原上的遊牧部落不會書寫，也不知財產的含義，對他們來說在戰鬥中逃離祇是戰略上的退却，而決不是怯懦的行為——他們將給中國人製造更大的麻煩和不安。



（臨潼）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陶俑戰馬（2米×1.72米）。

由秦始皇寵妃趕車駕馭的銅駟馬（陝西臨潼秦始皇陵墓出土）。

“他們十分善於誘使自己的敵手落入其預設的陷阱。當他們掌握了敵人的情況，就會像貪婪的鷹撲向獵物般地突然猛衝上去。但當他們感到自己被追蹤並將戰敗時，就會像煙雲般散開，消失得無影無踪。”^⑨

遊牧族傳統上習慣於使用笨重的戰車作戰，使用步兵攻堅，突襲防守堅固的城池，並善於使用“包圍戰術”。中國人被遊牧部落的此類游擊戰略搞得十分惱火，但是，他們明白必須把敵人的戰略納入自己的戰爭準備中，這樣才能阻嚇來自北方不斷增長的戰爭威脅。

中國人開始計劃改革邊境防禦和防衛觀念，一支新軍隊的構想在“蠻夷學校”中產生了，騎兵將被改造成為武裝力量中一支龐大的機動靈活的部隊。於是，繁育馬匹，改良馬種，以及尋覓大面積的牧場便成了當務之急。

由於優越的自然條件及同遊牧部落所棲息的草原相毗鄰，中國選擇了人煙稀少而又鄰近戰場的西北地區作為“育馬之地”。

漢王朝初年，就有中國馬同阿拉伯和大夏馬進行交配的記載。從這一時期馬的雕塑中所反映出的馬的毛色的變化及馬的體型更為高大來看，似可證實以上的記載。

在臨潼的考古發現之前，一九六五年，一些考古隊也曾在咸陽（係秦國故都，位於涇河和渭河匯合處的北面）東北方的西漢古墓中發掘到了另外一支軍隊，那是二千五百四十八個按嚴格的作戰隊形所排列的彩色俑兵。

這一發現證實了，當時騎兵部隊的力量已十分強大，並已在戰場上普遍使用。它們支援和掩護步兵，溝通各部隊之間的聯絡，增援需要加強力量的部隊。此外，還有四個裝備精良並擁有機動作戰能力的後備騎兵隊，足以粉碎敵軍的突襲和包圍。

基於這一戰術方式，漢王朝的軍事力量對遊牧部落，特別是對危及西北邊境的匈奴作戰取得了一系列的決定性勝利。前此，匈奴對中國人的安全和中國年輕政治集團進行了無休止的騷擾。

針對戰爭最初的失利，漢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即以漢高祖而聞名的劉邦力圖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加強並改造了騎兵。漢文帝繼續推行這一政策，並於公元前一七七七年使用八萬五千騎對匈奴軍隊進行反擊，取得了勝利。

稍後，公元前一六六年，當匈奴以十四萬之眾的騎兵由三千里外逐步逼進長安時，文帝指揮